

七十年代月刊五月號文章抽印本

(美) 克利斯多夫·華洛斯著 谷時虛譯

辛頓夫人和她的家

——
從普特尼到北京



辛頓夫人

辛頓夫人和她的一家

——從普特尼到北京

(美)克利斯多夫·華洛斯
七十年代雜誌社

編者按：本文譯自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廿六日「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星期日雜誌。辛頓夫人，是美國作家韓丁的母親，是韓儉(本刊曾登載她的演講稿)的祖母。本文敘述辛頓夫人一生的奮鬥，她的抱負和事業，她的家人和中國的關係。在貫徹本刊宗旨「了解人生」方面，本文提供了一個新的領域。



(上)一九七一年，周恩來在北京會見
辛頓夫人。

(下)辛頓夫人的兒子、著名作家韓丁
和他在中國長大的女兒韓偉。



(上) 辛頓夫人在中國大寨剝玉米。
(下) 辛頓夫人和大寨的老社員在一起。





△ 參觀幼兒園。

▽ 一九七一年，辛頓夫人在上海棉織廠工作了六週。





△辛頓夫人的孫女薩拉和大寨的女孩子在一起勞動。

▽辛頓夫人的孫兒孫女們，在中國的大寨。



辛頓夫人是座落於維爾莽州（Vermont）進步的普特尼中學的創始人，是位一直到了八十多歲還在從事滑雪及登山活動的人，是位熱衷於學習毛澤東革命的人。她以八十二歲高齡仍在大力推展她的原則。

一、與衆不同的一家人

辛頓家族的歷史，好像是一齣充滿奇特情節的喜劇。

首先是祖母卡瑪利達（Carmelia Hinton），現年八十二歲。不爲年齡和疾病所困，仍與一九二四年她丈夫去世以來一樣地決定着這個家族的基調。

其次是她的三位子女韓菁 (Jean Hinton)、韓丁 (William Hinton)、及寒春 (Joan Hinton)。他們現年均爲五十多歲，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他們常擔心他們的母親過分操勞。雖然他們對她的某些想法不盡同意，但他們對她由衷的愛，却溢於言表。

此外，她還有成羣的孫兒、孫女，他們都長得容貌俊秀，身心健康。雖然存在着通常的所謂輩分距離 (Generation gap)，但他們對她却是異乎尋常地親近，管她叫「加尼」①。

辛頓家裏甚至還養了幾條狗。

表面上看來，這個家庭的一切都顯得很平平常常，甚至還帶有幾分甜蜜的小康氣息，它似乎和一個普普通通的鄰居並沒有什麼不同。然而，就在這個看來似乎平凡的外表裏頭，却蘊含着頗不平凡的內情。

這是因爲辛頓家族具有一些與衆不同的獨特行爲。譬如像卡瑪利達自己，在三十年代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將她在威斯頓 (Weston) 的房產典當了，把得來的錢作爲經費以實現她創辦一所進步中學的理想。因爲這所學校位於維爾莽州的普特尼鎮 (Putney)，辛頓夫人乃將它命名爲「普特尼」。它現已成爲美國這類學校中最重要的一。

譬如像韓丁曾在中國總共住過將近十年，並成爲一位令人尊敬的研究共產主義革命的學者。然而，他並不是一直都被人尊敬的。當他在中國住了六年之後，一九五三年，他回到美國時，他的筆記被沒收了；此外，他還被傳出席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審問了三天。密西西比州參議員詹姆士·伊斯特蘭 (James Eastland) 在參議院議席上指他是一位叛

徒。

譬如像寒春曾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姆斯(Los Alamos)參加過發展原子彈的工作。當廣島吃了原子彈之後，她抗議政府將科學研究用於破壞方面。一九四八年，她前往中國和她的哥哥住在一起。在約瑟·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時代，她也受到攻擊，被控將原子秘密洩露給中國，並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北京約安」(她的英文名字叫約安Joan)。然而，她說她實際上是在內蒙古飼養牲畜。

譬如像韓蕩，她那比較正常的生活，不過是說沒有人指她為叛徒而已。三十年代時，她會和游農②在一起生活，替農場安定處(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替游農解決居住問題及提供其他服務的機構)蒐集資料。她還擔任過美國全國總工會(Federal Workers of America)一個支部的主席。一九四八年，她曾在賓州西部幫亨利·華洛斯(Henry Wallace)③組織競選總統的活動。此後，她曾在若干學校，如哈佛爾福特教友派會員中學(Haverford Friends)、多切斯特中學(Dorchester High)等教過書。

譬如像她孫輩兒女們的一些不尋常的經歷：如孫兒泰地會到過古巴，在甘蔗田裏從事勞動，孫女韓涼(Carna)④曾在中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最後，譬如像整個家族於去年(一九七一年)秋天在中國的團聚。寒春住在北京附近的紅星公社，韓丁回到中國打算蒐集資料撰寫另一本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八十一歲高齡的卡瑪利達則想繼續她那長達四十年之久、領着年輕人旅遊外國的老傳統；還有她所有的孫輩兒女們，也來到中國，在這

部非常特殊的家族歷史中扮演一份角色。

她的頭髮已由棕紅色變成銀白色，肌膚的皺紋沖淡了她面部的輪廓，矮胖的身軀現已微向前傾——但她那雙棕色的大眼睛，却仍然清澈明朗、炯炯有光。

人們首先從這兩隻眼睛就可覺察到卡瑪利達·辛頓充沛的活力，當和她交談時，這個印象將更爲加深。雖然她在追述以往的生活時，想到哪裏說到那裏，無一定系統，但她的思想却仍然迅捷敏銳。當她激動地說明一個觀點時，她那肥胖的手指老愛時鬆時緊。

對認識她的人而言，辛頓夫人的精力，猶如神話一般：一九一二年她是伯瑞恩毛爾(Bryn Mawr)學院⑤的鉛球冠軍；她曾經在加拿大的大山脈中翻山越嶺；在普特尼時，她愛領着學生在月光下作橫越鄉野的滑雪之旅。曾有一位身材魁偉的男學生，因怕在體力上達不到這位女創校人兼校長的要求而不願意到這裏來上學。

辛頓夫人身心活力充沛的最佳證明，或許是回述她前十年中所經受的一些病痛以及她應付這些病痛的方式。一九六二年，她是七十二歲。那年，當她在凱斯基爾斯山脈(Catskills，位於紐約州東部)中滑雪時，摔斷了一條腿。幾年以後，當在費城參加反越戰示威遊行時，摔傷了右邊的脛骨。一九六八年，爬山的時候又摔壞了左邊的脛骨。這次在中國旅行訪問的十一個月當中，今年（一九七二年）春天，她曾兩度中風。

她是不是爲最近的這些病痛弄得一病不起了呢？「我不把它們當作真正的中風，」她最近說道。「我並沒有癱瘓，」辛頓夫人說。實際上她的問題在於她感到精神太好。「我一定不能讓這種感

覺支配着我，」她說道。「我必須把這種感覺管制起來。我現在對自己說，『妳必須記住妳已經是八十二歲的人了，不可不把步調放慢。妳不可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事都攬下來。』」我發覺很不容易做到這點，」她繼續說道。「我不知道要怎樣來感受八十二歲。我自己從未經歷過八十二歲，我也沒法體會到別人到八十二歲是怎麼樣一種感覺。」

座落於賓州弗利烏德鎮 (Fleetwood) 的農場，是她於一九五五年從普特尼退休之後買下來的。到這個農場去拜訪的人，可以發現這裏處處顯示出她蓬勃的朝氣。在這裏，人們看不出「一丁點她作了二十多年寄宿學校校長的痕跡。在石砌的法國式農會裏，佈滿了她兩次訪問中國時帶回來的紀念品。」

「卡瑪利達把普特尼看作和自己的生命一樣，」辛頓夫人以前的秘書，後來一度担任校友會董事長的南西·韋斯特 (Nancy West) 最近說道。「人們都以爲她退休之後，她對普特尼是決不會放手的。」但辛頓夫人却不斷着眼於新的事物，從不眷戀舊有的成就；如牆上掛着的京戲臉譜、書籍上的毛澤東像、以及大廳中懸掛着的一幅絲繡的熊貓像等，便是她的這種精神的具體寫照。

二、早年生活

辛頓夫人的一生具有一些令人難以理解的特點：始終如一的目標，堅持不懈的原則，以及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分水嶺式的插曲。大多數人的人生歷程是無法以直綫的或完全合乎邏輯的方式來敘述的，但辛頓夫人的却是可以的。

同樣的，我們可以在她的人生歷程中，以及——透過她的影響——在她兒女及孫輩兒女的人生歷程中，找到一個最重要的時刻。這個時刻是當她在伯瑞恩毛爾學院二年級的時候來臨的。那時，她讀了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一篇論情緒的文章。如許多年後她在該學院校友雜誌中回憶說，「從這時起，這篇文章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其中有一句話這樣寫道，『如果你被你所讀到、所看到的事物深深地激發，就不應該讓這種情緒自動消散而無相繼的行動，採取行動吧！』」。

許多人是會被這種哲學打動的，但辛頓夫人的一生却是這種哲學的實踐。當她方從該學院畢業回到她在尼布拉斯加州（Nebraska）奧馬哈（Omaha）的家中時，她第一次實行了這個哲學。一天晚上，她在了一本雜誌中讀到一篇題名「首府第一棵聖誕樹」的文章。

「這就是說，不管多窮的人，都可以有聖誕樹，大家都可以來觀看把這棵樹點亮，」她最近回憶着說。「這棵樹是為所有的人而設的。」

「我想，呵！這是個好主意，這真是個好主意。然後，我突然想到，呵！天哪！為什麼這件事把我激動成這個樣子呢？現在的問題是我要是真的相信這是個好主意——用那句話來說：如果你對某事發生了興趣，並為它所深深感動，——那我就必須採取行動。這麼一說，我一定得給奧馬哈弄棵聖誕樹。想到這兒，我說，『好的，就這麼辦！』」

她在明尼蘇達州找到了一棵大樹，並將它安放在奧馬哈法院的前面。消防隊在樹上裝上了電燈。聖誕節夜裏，當地教堂的唱詩班來到這裏唱聖誕頌歌。一切都弄妥當了，只有一件事不對——那天的溫度在零度以下。

「人們像蜂羣一般，」辛頓夫人回憶着說。雖然事情已經離現在六十年了，但她對這件事的歡愉與抱怨却仍流露在言語之間。「他們不願留在外面圍着樹唱歌。他們擠進了法院……我試着把他們留在外面唱聖歌。我還記得，我站在那兒，張着兩臂，想把法院的大門就此攔起來。但人羣還是大量湧入，我好像在阻擋一股浪潮一般。」

這段插曲之所以重要，有好幾個原因：這表明她除了對詹姆士的觀念傾倒備至，她還熱衷於許多其他的觀念。並且，從這時候開始她一直奉行着這條原則——如果你被甚麼事物所激發，你就應立即採取行動。她不斷實行這條原則的最終結果就是創辦了普特尼中學。

一八九〇年，辛頓夫人出生於奧馬哈。她說她的父親對她的影響遠大於她的母親。父親，克里蒙特·車斯（Clement Chase）是一家周報和兩家銀行報紙的編輯。他在那個一心盤算着發財的美國中西部社會推動着文化事業。由於旅遊藝術家常在車斯家裏表演，辛頓夫人得以發展她在音樂和藝術方面的興趣。車斯還培養他女兒對野營生活的喜愛。辛頓夫人記得她第一次長途步行是在兩歲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當她母親露拉貝爾（Lula Belle）想把她女兒塑造成一位上流社會的淑女時，而她父親却已經在使她成爲一個女權主義者了。「他把我引上了正途，」她說道。「他認爲男孩與女孩都應該有事業。他要他的女兒們都上大學，他是贊同婦女解放的。」

在大學時代，辛頓夫人除了從詹姆士的哲學得到啓發之外，還認識到另外兩件事情。一個是從時候學生的黑人女工那裏學來的。「那個大學的學生裏頭大概沒有一個黑人女孩，」她說道。「她們是在那兒伺候我們這羣少爺小姐的。我們是長在他們身上的寄生蟲。」於是，「依靠自己」對她來說

變得重要起來了。人們應能料理他們自己的生活，甚至應該提供自己所需要的食物。

另一個認識是從一門教育學的課程中得來的。在這門課中，她開始接觸到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其他進步的教育家的著作。他們寫道，兒童應從實踐中學習，教育應是一系列真實生活的經驗，不該是一番死記硬背的「工夫」。還有，學校應顧到兒童整個的身心發展，他所要學的，不應只是一些具體的知識，而應是一些基本的人生價值。對於像辛頓夫人這樣深信藝術、健壯身體、戶外活動和勞動的價值的人來說，這種兼容並蓄的教育觀點自然是有吸引力的。

大學畢業之後，辛頓夫人拒絕了一個周旋於奧馬哈上層社會的機會，而前往芝加哥的霍爾救貧院（Hull House）——它是美國最早的社會貧民救濟社之一——替珍妮·亞當斯（Jane Adams）工作。她也選了研究院的教育課程。一九一六年，她和塞拜斯生·辛頓（Sebastian Hinton）結婚，辛頓先生是一位專利律師，他會經發明過攀登架（Jungle Gym）^⑥。

以後數年，她生了三位子女。但她還是抽出時間研讀關於歐洲幼兒院發展的情況，並且以典型的詹姆士作風在她伊利諾州（Illinois）溫內卡（Winnetka）家的後院裏創辦了美國最早的此類學校之一。

但辛頓夫人真正將她大部分的想法付諸實施，却是在她丈夫去世以後。一九二五年，她把家遷到劍橋（Cambridge），開始在具有創新精神的蔭丘小學（Shady Hill School）^⑦擔任教職。她在那所學校二年級任教的九年中，一直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來進行教學。

在每個學年的頭一個學期，她給她的學生們閱讀描寫牧羊人的故事和詩歌。到了下個學期，她就

搞隻活生生的羊，讓兒童們幫着修剪羊毛、編織羊毛，做成小小的羊毛墊子。「有一天，這隻羊從學校裏跑走了，」辛頓夫人笑着回憶說。「學校當時就在現在哈佛大學紀念館（Memorial Hall）後面原來的蔭丘。這隻羊一跑了，所有的小孩，包括我自己都在內，都順着克爾克蘭（Kirkland）街追着追牠。最後，一位警察在紀念館那兒把牠攔住了，我們才把牠放在手推車上推回學校。後來我們還爲這件事寫了一首詩呢。」

此外，學校裏還有其他令人興奮的活動在進行着。譬如，每位二年級的學生都要在草地上蓋一間木房子。「我知道孩子們是會喜歡做這種事的。他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關於木工和算術的知識——你知道，他們是必須測量的；——學到蓋房子所需要做的各種事情。」辛頓夫人解釋着說。

每棟房子有兩層樓。孩子們在大門上畫上一些小小的圖案，並裝上窗架。這些房子是靠小電池供電的。有一個晚上所有的孩子和他們的老師都住在這個位於劍橋中心的小村子裏頭，並且還在那兒準備晚餐和早餐。

「學校裏頭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發生，」辛頓夫人說道。「那時，要是有一個小孩不能來上學，他就會哭鬧起來。不能上學是件很洩氣的事。可是現在我向我的孫子孫女們問起他們學校的情形時，他們却感到那樣厭倦。我的心情不禁沉重起來。學校的生活應當令人感到興奮才對。要知道，孩子們畢竟是要把大半天的時間都花在學校裏頭的呵。」

生活不僅在辛頓夫人的班上令人感到興奮，就是在她的家裏——位於瑞德克利夫（Radcliffe）學院⑧附近的亞旺（Avon）街卅八號——也是如此。小馬、狗、貓及山羊等在這裏到處相互追逐玩耍，

無拘無束。辛頓夫人有很多住在劍橋以外的朋友，希望自己的子女進入蔭丘小學就讀，這些朋友的女就寄宿在辛頓夫人的家裏。

所有的小孩每天都騎着小馬上學。二十年代的劍橋並不比今天的更鄉村化。鄰居們都把這「英勇的」一羣叫做「自殺俱樂部」。實際上，我們連一塊皮也沒有碰破過，辛頓夫人不平地說道。但韓丁却記得有一次他騎着小馬走到蒙特奧本（Mt. Auburn）街中間兒，忽然馬失前蹄，差點兒讓電車撞上。最後，亞旺街的房子容納不了這麼多的動物，寄宿者和辛頓家的人，於是他們就在威斯頓另起了一幢房子和一間馬房。在那兒，辛頓家又添了兩頭牛和五十隻雞。

最後，辛頓夫人的「發展」還有一個環節，這就是國外旅行。丈夫去世以後，她就開始在夏天帶着她的三個孩子去旅行——拜訪她在墨西哥及在英國的親戚們，並且到挪威及美國的懷俄明（Wyoming）州遊歷。不用說，辛頓夫人的這些旅行確是不折不扣的探險。在墨西哥時，辛頓全家徒步前往墨西哥西部進行「遠征」。寒春那時才四歲。「除了每個人身上長了些虱子外，」辛頓夫人笑着說。「我們全都安然無恙地回來了。」在挪威的旅行是一樣的艱苦——沒有嚮導，全仗自己來徒步翻山越嶺。

回到麻州以後，辛頓夫人成了多那爾德·華特（Donald Watt）所倡導的「國際生活實驗」早期的領袖之一，夏天帶領十來歲的青少年住在歐洲人的家裏。薩爾鐘·史瑞佛爾（R. Sargent Shriver）^⑨曾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擔任過學生助理。

有幾次旅行是前往納粹德國的。辛頓夫人和她的團體會和希特勒青年團在一起相處了不少時間，

——他們清晨五時出發去遠足，並且參與社會上各種工作。他們這樣的精力與紀律給辛頓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辛頓夫人說，她會見過希特勒在魯爾河谷（Ruhr Valley）演講，令人頗有驚怖之感。她承認，「在德國時，我並不知道後來納粹主義會發展成什麼樣子。」一位那時的朋友記得辛頓夫人的團體在一次夏季旅行之後回到美國時，手裏搖着小小的納粹旗子。她的兒子韓丁說，「我母親當時在政治上是不怎麼高明的。」

從各方面來看，就辛頓夫人於一九四三年駕車從紐約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到麻州威斯頓的途中所得到的靈感而言，一切條件現在都已成熟了。她時常撰寫她的經歷，普特尼學校的校刊也常報導有關她的事蹟。人們常將伍德斯托克至威斯頓之行描寫得幾乎和聖徒保羅的大馬士革（Damascus）之行^⑩一樣的偉大。實際上，辛頓夫人那天下午的旅行，即使不是奇蹟，也是件很不尋常的事。就在這個下午，四十四年的生活經驗和想法奇跡般地完成了一次飛躍，形成了一項傑出的創舉。

三、一所新型的學校

在那次長途的汽車旅程中，辛頓夫人有很多思考的時間。她的子女已經進入了中學，大學預修課程的沉悶取代了蔭丘小學時的興奮。中學裏雖然也重視遊戲，但遊戲中却充滿了激烈的競爭精神。十年後當回憶這時的情景時，她這樣地寫道：「真正的教育中沒有憂鬱和沉悶，學校裏應充滿輕鬆歡愉。」為甚麼不能使蔭丘小學第二年級那種豐富多彩的歡樂生活在中學中重現呢？何不把韓丁、寒春和寄宿

生留下來，並且招更多的孩子，一起搬到遠離都市的一個農場去呢？學生們可以幫着修造及維護校舍、管理農場。孩子們晚上的時間通常都是白白地浪費掉了，那麼何不在晚上開展一些音樂和舞蹈活動或舉辦討論會呢？夏天的旅行也要照舊進行。此外，要使學生們成爲鄉下小城生活的一部分。

「當時我問自己到底喜歡一所甚麼樣的中學，」辛頓夫人最近說道。「突然我想（詹姆士是會以此爲榮的）：我大概應當自己辦一所試試看看。」

她在一周之內用鉛筆草擬了這所學校的計劃。這個計劃的開頭這樣地寫着：「人們或多或少都是在空中建造樓閣的。」而辛頓夫人的計劃却並不是朦朧不清，不可捉摸的。相反地，所有她想到的，都在普特尼一一地實現了。下列一些對當時來講是很創新、甚至是很激進的觀念，都在一九三四年系統化起來，並且真正付諸實施了。這樣重大的改革在辛頓夫人看來好像是理所當然，再自然不過的事。

1. 取消分數：「分數與實學有甚麼關係！」最近她這樣地問道：「分數只能引起虛假的競爭；你必須超過別人，否則你就會名落孫山。這是不對的，你應爲了求知而學習。」

2. 取消有組織的足球隊：「運動是爲了娛樂，不是爲了要壓倒對手。運動時是要盡力而爲，但這只是因爲技術越熟練人們的興緻才會越高。」

3. 男女合校：「最早從受到父親的啓蒙以來，我就一直相信男孩與女孩應同受教育。既然他們將來要結婚，要在一起生活，那麼從小就應該在一起長大。並且，說來也怪，當男人與女人、男孩子與女孩子在一起時，氣氛總會變得更活躍些。」

4. 不提倡宗教：「我看我是一位無神論者……我們有些人不是基督徒麼？爲甚麼我們還是有這麼

多的問題存在呢？精神上，我所信奉的標準是很高的，我相信自律、相信先人後己。不過，我感到人必須依賴自己。人老愛祈求上帝保佑，其實，人必須使自己變成神才行呵。」

5. 農場勞動：「對我來說，一個人若不從事體力勞動，就不是一個完全的人，就是在剝削別人。農場應成爲學校的中心，我常感到人們與生產他們食物的地方脫節。」

6. 藝術：「我認爲它是整個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譬如，我認爲青年人若爲應付考大學而停止音樂課是很不對的。我時常對青年人說，把紐約時報拿來看看，那裏面除了嚴肅的政治文章之外，還有藝術與戲劇的篇幅。紐約時報的內容範圍是很廣的。」

這種廣濶意義的學校課程是普特尼成立的基石。「我要求藝術、勞動、和準備進大學佔有同樣的比重。學術標準降低一點並沒有關係。我認爲一般學校要求學生寫的報告太多了點，要唸的書或許也太多了點。我想應該爲組成生活的那些事物勻出些時間。」

以上那些做法的宗旨，都在於喚醒她的學生的社會良心。「我感到這個世界是一個很不愉快的地方，我想，靠教育可以幫助兒童克服貪婪和自私心。很多進入這所學校的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可能成爲政府裏的領導人。由於受了這種教育，他們對我們的問題或許會有一種不同的、更道德的看法。」她的這種觀點是羅斯福時代樂觀主義以及許多年前從黑人女工那裏得到的感觸的混成品。

辛頓夫人是以一種典型的理想主義方式來創辦這所學校的。她先在維爾莽州普特尼鎮買了個農場，然後才去聘請教員。她先答應付給教員較高的薪水，然後才招收學生，再用收來的學費支付工資。她將座落於威斯頓價值三萬美元的房產以一萬元就抵押了。結果，這些辦法還真的都行通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普特尼開學了。共有五十四名學生，他們都是那些相信辛頓夫人想法的朋友的子女。但其中有些人並未能對之深信不疑。很多父母願意把他們的女兒，而非他們的兒子——或至少不是他們指定將來有所作爲的兒子——送到一所試驗性的學校就讀。「我們頭一批學生裏很有幾個古里古怪的人，」一位那時的學生說道。「我記得有位男學生老愛紮着一條印第安人的頭帶，並且顛着脚尖走路。」

雖然辛頓夫人對大學預修課的不良影響頗爲非難，但她了解，只有當她能夠證明普特尼的畢業生可以進入最好的大學時，她才能夠吸引優秀的學生。第一年的應屆畢業生都獲准進入大學。而且更有說服力的是，除一名畢業生外，其餘的畢業生都決定在普特尼多呆一年。

這一切都是沒有犧牲該校創校原則的情形之下所取得的成就。學生清晨早起，做些農場上的雜工。上課的時間從早晨八點一直到午後，中間休息的時間用來吃中飯。下午的課餘時間用於運動和勞動（或在農場上幹活，或打掃維修校舍）。晚上則用之於藝術及手工。白天自修的時間和每周中有一個晚上用來做作業。

教員與工友平等看待，都一律參加學校的行政（再度顯示伯瑞恩毛爾學院那些女工的影響）。隨着旅館、商店、戲院、打鐵店、密爐在校園裏一一出現，集體精神與自力更生的意識也與日俱增。

據這間學校早期的學生說，今天學生所喜愛的粗藍布工作裝後負背包（Dungaree-backpack）的裝束在普特尼三十五年前就很普遍。不過，辛頓夫人對服裝也有一點點規定，譬如她要求吃晚飯時，男生須打領帶、着外套，女生須穿裙子。要不然，學生會很快地懶散頹廢下去，「她解釋說。」况且

着工作服吃晚飯，對在廚房裏辛辛苦苦爲大家做飯的人，也是不夠尊敬的……我只是想在一所很不講究虛文縛節的學校裏訂出極少的一些限制。」

雖沒有宗教的禮拜，但辛頓夫人於每個星期天晚上開一次討論會來談論她的理想。夏天的旅行照舊進行——首先是到歐洲，歐戰爆發後則改爲徒步橫越美洲大陸，沿途分別在紐約州收採乾草、在威斯康辛州及南達科他州打熟麥和小麥。爲了密切與普特尼鎮的關係，學生們協助推動當地的各種工作，並在學校裏舉辦慶祝節日的活動時，邀請鎮裏頭的人一同參加。

把子女送到這間學校就讀的人大半是東部的自由主義者；其中有知名的教育家，如前哈佛大學校長詹姆士·柯南特（James Conant），有在麥卡錫時代被攻擊的人物，如阿及爾·希斯（Alger Hiss）和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有「紐約人」（New Yorker）雜誌的一批作家，還有普特尼鎮的一些居民，爲當地的商人（後爲美國參議院議員）喬治·愛根（George Aiken）及農民紳士（後爲外交家）埃爾斯渥次·彭克（Elsworth Bunker，現任美國駐南越大使）；此外，還有一些藝術家，如鋼琴家魯道爾夫·塞爾金（Rudolf Serkin），當他的小孩在那裏上學時曾爲學校開了一個音樂演奏會，人們至今還對之津津樂道。動態設計師家亞力山大·卡德爾（Alexander Calder）的子女也曾在那裏上學。他的一件作品至今仍懸掛在學校的餐廳中。

這所學校既是個震人心絃的地方，又是個令人陶醉的地方。畢業生們對於把它比作一個三場表演同時舉行的馬戲班，還嫌不夠。他們堅決認爲，在普特尼至少共有七場至八場的表演在同時進行着。由上看來，這所學校畢竟是它的校長個人的縮影。換言之，即按照她自己的構想來創辦和管理。

雖然全體學生和教職員都參加學校的行政，但一般同意，「H夫人」——這是衆所週知的稱呼——可以對任何問題負責。她覺得教師在課堂中應主持討論會，而不應只是一個人獨拉獨唱地講演。教師的聘請或辭退均依據這一標準。錄取學生的標準以及錄取後對學生管束也是按照她的概念來制定的。

「如果你想進普特尼的話，只要有一兩樣特別的興趣就行了，」韓丁說道，「優異的數學成績並不能引起母親特別的重視。如果你的興趣是在寫短篇故事、或採集蝴蝶，那你準能錄取。」這種把這塊地方弄得如此與衆不同的專行獨斷精神終於爲辛頓夫人惹來了麻煩。

當問及一九四九年教員罷教的情形時，她的臉上仍然流露出那時的創傷。「在普特尼的校史中這是一塊非常令人心痛的瘡疤，」她說道。根據她兒子的看法，這是他母親一生中痛苦最痛的插曲。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四七年，辛頓夫人聘請了一位教師。當她發現他只在課堂上講演而且又不願改變他的教學方法時，就請他離職。然而，這個人却是一位工會的組織者，他發動了大約半數的教師反對校長。他之所以能夠發動這些人，是因爲當時很多教師對辛頓夫人那種純憑自己對每位教師工作的評價主觀地決定工資高低（即在基本標準之上增加多少錢）的發薪辦法感到不滿。

想不到這所總共才有一百七十名學生和七十五位成年人的學校裏，意見竟然不能溝通了。造反的教師們成立了一個工會支部。一九四九年春天，他們罷教三天之久。

這年的年底，雖然教師們的大部分要求都被接受了，可是這個工會的許多成員却還是紛紛離職他往，而一種背叛感却一直揮之難去。辛頓夫人向來將普特尼看成是個小集體^②，在一個機構中如存在着兩種權力基礎是和這種看法無法相容的。縱然後來這個工會（由於大部分成員離去）解散了，事情

也總和以前不大一樣。據那時普特尼的一位教師兼管理員約翰·霍爾頓(John Holden)說，「那次罷工之後，卡瑪利達喪失了不少自信。」她一直對學校握有最後的控制權，而把董事會^⑬當成一個諮詢機構。她覺得學校應由教育家而非商人來管理。然而，在那次罷工之後，她感到需要一個緩衝，於是就把她最後的裁決權交給一個新成立的董事會。說辛頓夫人從此失掉了以往的天真是不算太誇張的。

可以預料，當普特尼從試驗的階段發展成定型的學校之後，從伍德斯多克至威斯頓的旅程中所產生的理想主義勢將隨歲月而日益淡化。縱令如此，這所學校始終遠遠地走在時代的前頭。辛頓夫人當時就實行了不少今天被稱爲是最新改革的方法——如小組教學、獨立學習、時間的調配等。現在，很多中學正開始試用遠在一九三四年辛頓夫人計劃中就有的的一些觀念——如男女合校、社會參與、取消分數等，來應付入學人數日減的趨勢和在學生中蔓延着的感到教育脫離生活的情緒。可以和這種現象作爲鮮明對比的是，從開辦那一天起，普特尼在招生方面就從未遇到過困難。

一九五五年，在做了二十年的校長之後，辛頓夫人退休了。「我實在不願意離開，」她說。「但在我面前却有這麼多的事情使我感到興奮。」聽起來這或許像一位六十五歲的老人在走夜路時吹着口哨，給自己壯胆。但結果却證明這句話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四、辛頓家族與中國

在以往的二十五年中，在美國沒有一個家族比辛頓家族更接近中國。韓丁在中國斷斷續續地住了

差不多十年，他現在正在撰寫他的第五本關於共產主義革命的書。他的女兒韓偉於去年十一月回到美國以前，曾在中國度過了她前二十一年的歲月。

寒春從一九四八年起，就一直住在中國，並且在那兒成立了自己的家庭。當全家在過去的一年中訪問中國之後，辛頓夫人的孫輩兒女大都開始學起中文來了。

身爲一族之長的辛頓夫人，已把她五十多年來獻身於教育的熱情和精力悉數投入了對毛澤東政權的支持。

儘管從普特尼到北京或許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但對於那些真正了解他們的人而言，辛頓一家人和中國的關係却是很自然的。首先被中國的革命所激發的兒女們身上正顯示母親對他們的巨大影響。同時，由於她追隨兒女們開闢的道路，辛頓夫人又一次表現出她那包容新觀念的能力。

辛頓這一家人爲中國的革命所吸引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爲中國革命體現了很多辛頓夫人許多年來所倡行的觀念。

「我們在普特尼上學時，辛頓夫人時常談到拓荒精神，」溫詩夫人（Winship）回憶着說。「她時常談到一個人應該經風雨、見世面，應該不斷開闢新的領域。她也常談到體驗農村生活，談到社會良心。我有時想，她的子女們將極難在美國找到這種新的領域，以及方才所提到的一些其他事物。所以，對於他們最終落腳在中國，我一點也不覺得驚訝。」

韓丁最近談到毛澤東在中國所建立的社會與她母親在維爾莽州所建立的社會之間的相似之點。他指出兩個社會都有效地結合了理論與實踐，並且都重視全面發展的、會做各種事情的人。他說，尊重

體力勞動以及自力更生，平等精神，也是中國和普特尼所共有的，對於人類改造自己生活的能力，這兩個社會都抱樂觀的人道主義的態度。

韓丁接着說，兩個社會之間也有重大的不同之處。中國的革命是產生於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而辛頓夫人並沒有這樣來考慮問題。儘管如此，它們之間却能有這樣相似的地方是很驚人的。「母親本能地做出了很多中國革命所自覺提倡的事情，」他說道。「她做這些事情時，雖沒有他們（指中國）的理論基礎，但她還是這樣地做了。」

辛頓家族是在一九四三年與中國結上了緣的。那年，韓丁在新罕什州（New Hampshire）的一個為社會服務機構中工作，這個機構是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些良心的兵役拒絕者而設的^⑭。這時，他是一位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者。然而這時他正巧唸了斯諾（Edgar Snow）所著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這是一本記述毛澤東革命的書。於是這本書成了他的「奧馬哈聖誕樹」。

「我是真的被那本書感動了，」他回憶着說。「它使我想起，這本書中所描述的一切正是我母親一生所談論的事。……我感到假如我是一個中國的農民，我也會跟毛澤東一起去打日本人的。由此我感到有些戰爭還是應該打的，於是我就申請服兵役了。」

韓丁的服役申請因耳膜穿孔而被拒絕。但他於一九四五年還是以一名國務院駐重慶作戰情報處（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in Chungking）工作人員的身份來到了亞洲^⑮。戰後他回到了美國，但於一九四七年時又作為聯合國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的拖拉機技術人員的資格重返中國。（作者按：韓丁從普特尼畢業

後進入哈佛，但兩年後因感到哈佛與普通人民脫節，於是轉學到康奈爾大學的農學院繼續學業。

這次韓丁帶着他的妻子史克(Bertha Sneek, 麻州 Maynard 人，現仍住在北京)來到了中國。他還鼓勵他在康奈爾的同學陽早(Erwin "Sid" Engst)去亞洲。後來韓丁的妹妹寒春對政府控制科學研究日感不滿，也去了中國，並和陽早結了婚。

當內戰的烽火燃遍中國時，這些美國人都站到了共產黨那一邊。韓丁在解放區教過英文，並且曾和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隊一起在農村工作過。寒春和陽早則在內蒙古的一個牧場上工作。

韓丁和史克生了個女兒，即韓涼。後來他們離了婚。一九五三年韓丁回到美國，正巧投入了麥卡錫主義的虎口。

韓丁帶回一小箱關於中國土改的筆記，他希望根據這些資料寫本書。美國海關卻將這些資料沒收了。

參議院開始對他進行調查。一九五六年，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對韓丁進行了一連三天的審問。「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考驗是很嚴酷的，」他說道。「但真正說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實在是很有意思的。我一向喜愛戰鬥。那些天的審問，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經歷。」

韓丁認定這些參議員都是些欺軟怕硬的廢物，要和他們鬥就得給點厲害他們看看。他對這些參議員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了一番調查。這樣當代理主席華克爾(Walker, 艾達荷州參議員)說，韓丁的箱子裏裝着「大量企圖摧毀美國的資料」時，韓丁便反控他與「地下社會」有所牽連。當一位參議員說韓丁威脅到國家安全時，他答覆說，委員會應調查它的主席伊斯特蘭參議員，「這個人在南方煽

動人們無視最高法院通過的民權法令。這種行爲對我們的社會是非常危險的。」

最後，小組委員會到底還是沒收了小箱子裏的筆記。伊斯特蘭後來在發言中聲稱，韓丁的資料是「一位叛徒的自傳。……就我所知，自冷戰開始以來，從沒有像這樣的東西落到自由世界的手中。」

韓丁直到一九五八年才通過法庭的訴訟取回了他的資料。根據這些筆記，他寫了一本書——「翻身」(Fanshan)。不如伊斯特蘭所料，這本書沒有震撼美國。但是，它却成了今天美國大學中國歷史課的必讀教材。

辛頓夫人說，在麥卡錫時代，記者們時常打電話給她，要她答覆關於她女兒寒春將原子彈秘密洩露給中國人的指控。「他們把她稱爲叛徒，簡直把我氣壞了，」辛頓夫人說道。「我告訴他們，她在中國和科學研究毫無關係。她是在飼養六萬隻北京鴨。」

辛頓夫人自普特尼退休後，愈來愈對政治發生興趣。她在「婦女爭取自由和平國際聯盟」中(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工作，促進對中國的了解，後來還參加過反越戰的示威遊行。十年前當她作環球旅行時，不顧美國政府的禁令，坐飛機到了中國在她的女兒寒春那裏住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兒女們的參與引起了辛頓夫人對中國革命的興趣，隨後她又日益認識到這場革命與她自己的理想是那樣相似，於是她愈來愈熱烈地擁護中國毛澤東主義者的革命。這種熱情在她去年訪問中國時達到了高潮。

作爲與西方和解的一個步驟，中國政府邀請了幾位會撰寫過有關中國革命的重要著作的美國學

者。韓丁於一九七一年四月應邀前往中國。

辛頓夫人本來也打算再度探望寒春。但她一想，若能像三十年前在歐洲及美國遠西地區遊歷時一樣，帶領一批年青人在中國作勞動旅行不是更好嗎？一九七一年八月，韓丁打電報通知她說，中國政府准許她帶十五人同行，其中包括韓菁的子女，「年齡在三十歲以下，都是妳本人所認識的、對中國友好的人」。

辛頓夫人對這次旅行的安排，是有自己一套肯定的想法的。「中國人常請重要的客人吃海參，」她說道。「中國人認為這是一道很珍貴的名菜，可是吃起來卻是挺滑膩的。有人把『重要人物』的參觀遊覽叫做『海參待遇』。我不要那種樣子的旅行。我真正希望的是，這些年輕人與中國人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勞動。我要他們與中國人打成一片。」

在這次的旅行中，果然很少吃到海參。參觀北京之後，這個團體在大寨——一個約有四百人的農村集體——呆了一個月，參加秋收。在那裏，辛頓夫人和一位大她一歲、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辛頓夫人把她叫做「我的夥伴」(My buddy)——一道剝玉米。

辛頓夫人說，堆積如山的玉米都待剝皮，看起來，這個工作需要好幾個月才能做完。然而，有一天當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參觀的時候，這個集體的負責人却說第二天就必須要把皮統統剝光。當辛頓夫人於次日晚間回來時，她的一個孫女跑來大聲地對她喊道，全部工作已經完成了。

「我們興奮地跑到場院裏一看，果然所有的玉米皮都剝完了。我們高興得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以極大的熱誠工作而取得這樣的成功，使人們的生活充滿了歡快。」

勞動旅行團繼續前往古城西安，並參觀在革命低潮時期毛澤東在延安住過的窯洞。在上海棉織廠工作了六週，後來又會見了周恩來。

「在中國有種氣氛，」辛頓夫人最近說道。「這就是不爲利潤、不爲金錢，而是爲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中國而工作；他們正在實現這個目標。在中國，對人的關切和照顧，真是無微不至。」

今年（一九七二）春天，辛頓夫人在中國會兩度中風。第二次中風後，曾有十七位醫生參與會診。甚至現在回到弗利烏德農場之後，她還是不知道——當談到這兒時，她顯得有點兒侷促不安——爲甚麼中國人派這麼多的醫生來照料「只不過是這麼一個老太太」。

她說，她會對醫生講過，如果她康復了，她將致力向西方人報道中國對全世界可以作出甚麼樣的貢獻。她說，等她體力恢復了，就要給人講演。同時，她正編寫資料準備送給周恩來，向他報告勞動旅行團的成員們在中國訪問了數月之後現在正幹些甚麼。

她充沛的體力已大部分消耗掉了，她的夢想也減少了。但她的活力却仍未稍衰——對新觀念的振奮，堅貞的社會良心，更重要的是詹姆士的那種積極精神——假如你爲什麼事物所激發，你就應當立即對它採取相應的行動。

辛頓夫人最近在弗利烏德農場說：「照我看哪，只爲活着而活着，每天睡睡覺，吃點好的，散步，這樣年復一年是沒有意義的。那不是生活。假如我能作出貢獻，活着還算一回事，如果停止創造，那還不如死掉。」

譯註：

①「加尼」就是奶奶的意思，原爲 Grany，即 Grandmother 之俗寫。因她的長孫泰地 (Ted)，即愛德華 Edward 之小名或暱稱) 小時發不出其中的“r”音，所以就成了 Gani，以後就被她的孫輩兒女延用了下來。

②游農 (Migrant farmers) 是季節性的農業工人，由南到北，隨着水菓、蔬菜的成熟季節而來回遷移。他們是臨時的採集工，工資極低，又因時常遷移，所以生活極不安定。

③亨利·華洛斯曾於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担任羅斯福政府的副總統，隨後出任杜魯門政府的商業部長，但因在外交政策上與杜魯門有所爭執，一九四六年遂被迫去職。一九四八年，成立進步黨，糾集各種進步組織，競選總統。一生對美國農業政策、農民福利，頗多建樹。

④她的英文名字和她祖母的一模一樣，也是 Carmelita。按西方習俗，常喜以祖父母或父母的名字爲子女命名，作爲對長輩的敬愛。

⑤伯瑞恩毛爾學院位於費城西方約十一公里之伯瑞恩毛爾鎮。創建於一八八五年，初期是一間女子文理學院，後來始招收男生。

⑥是用鐵管或木頭做成的高大的架子，是給兒童在上面爬着玩的。差不多所有的幼兒園和兒童遊戲場所都有這種設備。

⑦ 蔭丘小學現已由位於劍橋中心的蔭丘遷於劍橋西方的柯立芝 (Coolidge) 山丘。

⑧ 瑞德克利夫是附屬於哈佛大學的女子學院。哈佛大學的大學部，男女分校。瑞德克利夫學院雖在行政與財務上獨立於哈佛大學，但在教務上卻與哈佛大學一體。現在有人要求將瑞德克利夫女校與哈佛完全合為一校，但因種種實際困難，尚未能成爲事實。

⑨ 史瑞佛爾曾爲上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 (McGovern) 的競選伙伴。他是小甘迺迪的姐婿，曾出任美國駐法大使。

⑩ 聖徒保羅本熱心猶太教，並曾迫害過初期基督教會的信徒。據說，有一次當他取得公會的授權書前往大馬士革捉拿基督徒時，在路上耶穌忽向他顯現，呼召他作使徒。保羅看見亮光又聽見耶穌聲音，於是遵命進城。城裏的一名基督徒亞那尼亞 (Ananias) 前來接見，並爲他禱告及施法。從此保羅放棄猶太教，改信基督教，極力宣傳基督教旨。

⑪ 動態設計 (Mobile design)，是一種現代派藝術，專設計一些懸空掛着的藝術品，它的特徵是使藝術品各部分的重力或拉力在運動中能保持平衡協調，譬如可以隨空氣的流動而擺動，但卻能不失其平衡。由此，人們可以得到一種驚險與和諧的動態美感。

⑫ 辛頓夫人認爲學校應是一個友愛的集體，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其中人人平等，不承認有僱主和僱工的關係。一切事情都是商定執行的，從來沒有條文。她認爲搞起工資標準，搞起工會，搞成校長和教師兩種權力的對立而非統一，就會把她這種理想主義砸碎了。由於她的這種想法與實際社會相差過遠，所以終歸失敗。

⑬原文是 board of directors，一般應譯為董事會，但董事會一詞通常帶有資產營業性質，這卻不是辛頓夫人的原意。照她的那些理想來看，她是不肯讓「掌錢」的人來管理學校的，所以學校事實上沒有董事會。但根據法律規定，創辦學校必須要有一個機構監督財政，所以就成立了這麼一個名義上的 board of directors，每隔幾個月討論財政的收支，僅此而已。但後來經過那一件事後，她不得不和社會一般的慣例，讓商人掌管學校，因而遂將原來的董事會加以改組。

⑭在此服務一定期限之後即可免服兵役。

⑮按原文有誤。當時的作戰情報處與國務院無關，其中國科是由進步學者歐文·拉鐵摩爾所主持。這個機構直到戰後才轉由國務院管轄。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文咸東街83號三樓

承印：大千印刷公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定價港幣五角